

《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

阎学通 黄宇兴

内容提要 争夺霸权是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也是《战国策》的核心内容。该书中的人物普遍认为霸权以综合实力为基础。一些人认为,政治实力是霸权国综合实力的核心要素,而政治实力的强弱则主要取决于人才政策,因此人才争夺成为霸权争夺的根本。这些人物在强调实力的同时也关注国家间规范的作用。他们认为规范是霸权合法性的基础,遵守规范可为霸权国对外动武提供合法性;霸权国建立新规范是必要的,但也有风险。书中主要讨论了兼并和结盟两种争霸战略,这两种战略都以战争为前提。书中的争霸思想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化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实力、体系、大战略方面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思考。

关键词 霸权 实力 规范 战略

《国际政治科学》2008/4(总第16期),第79—102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战国策》是一本记录战国历史的著作。学界对于该书的思想内容多持否定态度。一位认为该书缺乏思想的学者说：“《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才能遮盖不了它在思想上的贫乏。”《战国策》作为历史记录显然难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仔细阅读该书，还是能发现许多启迪性的思想火花。争夺霸权是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的主题，因此该书中有许多关于霸权问题的议论。该书距今至少已有1900年了，然而书中许多关于霸权问题的认识仍能用于解释现代的大国争霸现象。这意味着当年的一些认识可能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本文试图从霸权的实力基础、规范对霸权的作用以及争霸战略原理三个方面，归纳该书有关霸权的思想认识，并探讨这些思想认识对发展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

一、分析视角

有关《战国策》的研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语言文学研究，二是考据研究，三是思想研究。语言文学研究与本文的研究相关性较小。考据研究有文本考据和事件考据两类，两者为理解《战国策》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提供了历史背景知识和文本知识，但没有思想方面的分析。思想研究文献中，虽然缺乏有关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成果，但已有学者从政治思想、用人主张、人生哲学、处事方针四个方面分析了战国时期纵横家们的思想。有学者认为，《战国策》体现了战略至上、策士谋略是决定因素以及重视外交的思想。有学者从思辨的角度分析纵横家的思维方式，并注意到20世纪的世界格局和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的相似之处。然而，这些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战国策》中的国家间的政治思

一般观点认为，《战国策》是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战国时期史官和策士们辑录的史料编辑成书并定名的。学者们对于该书的作者、书中记录的真实性，以及文字含义尚有争论。如果书中人物身份不明，本文将根据史学界多数人的共识为准。本文摘引的原文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战国策》为准。有关《战国策》版本和编著者的讨论参见胡如虹：《战国策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2页；罗根泽：《罗根泽说诸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傅玉璋：《中国古代史学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7页。

熊宪光译著：《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高晓颖：《史记与战国策的比较研究》，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6—7页，第11—12页。

王晶雄、商景龙、管秀：《战国策与论辩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07页。

想,更缺乏以霸权为主题的研究。

本文侧重于分析《战国策》中有关国家间政治的思想,因此关注的是书中文字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观念。鉴于思想主要是通过语言表达的,因此本文是通过书中人物的语言来分析其所表达的思想。《战国策》中有很多话是出于游说的目的,因此话语与事实并不一致,存在夸张和贬低的现象。然而,本文分析的目的在于根据书中人物的语言观察古人对于霸权问题的思想认识,因此书中的记录是否真实,以及书中人物所说话的政治目的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鉴于本文的主题是分析《战国策》中的霸权思想,因此文献回顾也是与霸权的实力、规范和战略三方面直接相关的内容。

虽然缺乏从霸权实力基础角度分析《战国策》的文章,但是许多学者在研究《战国策》时,注意到战国时期的人才争夺与争霸行动紧密相关。例如,有学者认为:“《战国策》的人才观念似乎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当它被纳入崇尚韬略智谋这条主线时就显出了特殊的意义。”这种分析突出了人才在争霸中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战国策》中将人才视为国家存亡根基的思想。也就是说,人才对于争霸国是重要的,对于不争霸只求生存的国家同等重要。有学者认为,《战国策》体现了国家竞争是人才竞争的思想,但认为招揽人才是谋略权术。这种观点虽然认识到人才对于提升国家实力地位的意义,但将延揽人才视为谋略权术,似乎未体会到《战国策》中将人才视为国家政治实力核心的思想。一位观点更加深刻的学者认为,在《战国策》中“有政治头脑的统治者,把对人才的竞争,往往看得比城池的争夺更为重要,常常是以占有人才作为占据城池、夺取财物的先决条件。”这种分析看到了政治人才是增强所有国家物质实力的基础,但不足之处是忽视了书中有关人才决定霸权性质的论述。政治人才不仅能为国家增加资源性实力,而且人才的性质决定了霸权的性质。

很多学者认为,从春秋到战国是一个道德规范在外交中作用日益衰落的过程。例如有学者说:“在《战国策》中,作者鼓吹的是不择手段追逐功利的人生哲学,什么礼义诚信,忠孝廉耻,都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丝毫无法规范人们的行

张彦修:《战国策 主题思想试探》,《管子学刊》1999年第2期,第64页。

张彦修:《纵横家书:战国策与中国文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7页。

贾传棠:《战国策 人才论》,《郑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第49页。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为准则。还说：“战国策士否定礼义，鄙视传统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崇尚的是权谋，是对背信弃义的无所谓。”有学者指出：“春秋时期，霸道尚‘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时期，各国诸侯连掩饰霸道的两个幌子——‘义’和‘正’都不要了。”这种观点认为，《战国策》描述的争霸行为缺少国家间规范的约束，霸权本身也不需要履行国家间规范，不需要具备合法性基础。然而，仔细阅读《战国策》，我们发现许多策士的论述强调遵守国家间规范对于获得或维持霸权的重要性。有学者虽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认为战国时期的策士们强调仁义道德的目的是用道德规范掩盖争夺霸权的实质。例如，有学者说：“苏秦、张仪口头上所讲的仁义，其概念和儒家传统的仁义概念并不相同，归根到底是为其利害、权术主张服务的，言在此而意在彼。他们对于春秋时期盛行的仁义道德、尊卑等级实际上是排斥的、批判的。”这种分析肯定了《战国策》中关于履行国家间规范对于实现霸权具有积极作用的观点，但却没有完全理解战国策士们重视规范的原因。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分析，规范是一个霸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霸权国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维持霸权秩序的基础。战国时期的策士们不借助规范而只靠实力是获得不了霸权的，因此他们对国家间规范的重视是真诚的，以此掩盖利益动机并非主要目的。

多数有关《战国策》中争霸战略的分析均落在策略层面上，不注重争霸战略逻辑和原理的分析。有学者关注《战国策》有关“策”的特点，并将书中的策略归结为，“政治策中，有改革图强之策，用贤去谗之策，固地凝民之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策等。外交策中，有联合阵线之策，分化瓦解之策，心理威慑之策，欲取姑与之策，雄辩服人之策等。军事策中，有‘按兵后起’之策，协同作战之策，纤弱后灭之策，乘机因势之策，以敌制敌之策，用间反间之策。强者有求进之计，弱者图存之谋；两强或勾结以互利，或反目以相攻；亦各有其策。胜者有胜者之方，败者有败者之法，坐视者有‘渔翁得利’之算，挑动者有‘黄雀在后’之想。”这种归纳使我们看到《战国策》中战略的多样性，但却不足以使我们了解当时争霸大战略的主要分歧是什么，主要争霸战略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郭丹：《左传国策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70、173页。

王扶汉、孟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第 7页。

胡如虹：《战国策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60—161页。

于汝波：《战国策 谋略思想析要》，《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 1期，第 96页。

有学者甚至认为,苏秦、张仪等人的合纵连横都是满足诸侯急需的短期行为,是“超短线策谋。”这种看法似乎不符合战国时期大国争夺霸权的实际政治目标,而且会使人们忽视《战国策》争霸战略对当代大国崛起战略研究的启示。

二、霸权的实力基础

《战国策》有很多关于霸权实力基础的讨论。这些讨论涉及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政治实力与其他实力要素的关系、政治领导力以及地理条件等问题。书中所阐述的观点虽然以农业经济和冷兵器为基础,但其道理却具有超越时代的适用性。

(一) 综合国力是霸权的实力基础

《战国策》中的战略家们在讨论霸权的实力问题时,多从综合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所分析的国力要素具有不同性质,并非如当前有些人将综合国力理解为是所有不同经济范畴的实力要素。在他们所讨论的国力要素中,经常提到的实力要素是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这四要素。例如,苏秦在为楚威王分析楚国赖以称霸的实力基础时,分析的就是这四要素。他认为楚国之所以获得霸权,所依靠的实力是领导者的贤明、地理上的优势、军事的强大以及经济支撑能力。他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郟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

书中的人物们不仅有许多强调霸权的实力基础是综合国力的议论,而且其中有些人物还认识到增强不同实力要素的途径是不同的。这种认识虽然不能完全等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实力要素不可转换原理,但已经具备了不同国力要素只能实现不同国家目标的含义。司马错对秦惠王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王随之矣。”司马错

王扶汉:《文白对照全译战国策》,第3页。

《楚策一·苏秦为赵合从说楚威王》。

《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

对国力要素与综合实力关系的总结,含有三层认识。一是增强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要分别靠开拓土地、改善民生和实行德政来实现。二是只有这三项实力要素都强大的国家才能获得世界领导权。三是政治实力是获得世界领导权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比军事和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条件。

书中的策士们虽然普遍认为争夺霸权需要综合国力,但他们并没有衡量综合国力的共同标准。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而把一国吹捧的十分强大,把敌对国家的实力缺陷说得十分严重。缺少对国力衡量的共同标准这一问题延续至今,现代国际关系学者仍未能解决。虽然书中的人物们对于一国综合实力的评价往往比较随意,但他们从多种实力要素的角度分析霸权实力这一点表明,他们认为单一实力的国家获得不了霸权。

(二) 政治实力是霸权实力的核心要素

《战国策》中的政治人物在霸权国的综合国力由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四要素构成这一点上没有争论,但是对于这四要素中何者更为重要的认识则不同。通常人们注重的是《战国策》中强调军事实力重要性的论述。例如,苏秦与张仪两人虽然政治立场迥异,但他们在分别向秦惠王讲称霸之道时,都说要称霸就得靠军事实力。苏秦总结了以往历史上称王称霸的经验,得出了使用武力是获得霸权的必由之路的论断。他对秦惠王说:“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张仪则告诉秦惠王,齐国靠五场战争获得霸权,因此秦国要称霸就得打仗,就得用战争征服荆国。他说:“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四邻诸侯可朝也。”

然而,《战国策》中也有许多强调政治实力具有决定性的论述。政治实力是个现代概念,与其相对应的古代概念是“德”、“仁”、“道”、“义”、“法”、“贤”、“圣”等。例如,苏秦虽然认为称霸必须进行战争,但也说政治与人口、土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秦策一·张仪说秦王》。“诎”,屈;“子”,慈爱;“元元”,百姓。

地、军力相比对霸权更有决定性意义的话。他以尧的人不多、舜的地不大、禹的部落小、商汤和周武的军力不强却都能称王称霸的例子,论证政治正确是称霸的关键。他对赵惠文王说:“臣闻,尧无三夫之分,舜无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诸侯。汤、武之卒不过三千人,车不过三百乘,立为天子。诚得其道也。”苏秦的这句话并不是否认其他资源性实力要素对于霸权的重要性,而是说,就实现霸权这一具体目标而言,具有操作性功能的政治实力是首位的。楚国春申君的谋士与苏秦持有相似的看法,他也认为,如果君主贤明,在资源性实力要素较弱的情况下也能得到霸权。他以商汤和周武王以小地方称霸天下的例子证明这一观点。该谋士对春申君说,“汤以亳,武王以镐,皆不过百里以有天下。”

书中似乎没有比较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重要性的讨论,但有关于政治实力与地理优势何者更重要的争论。在争论中,强调政治实力的一方表现出较强的说服力。例如,王钟认为晋国强大靠的是地势险峻,加强地理优势可以称霸。当魏武侯感慨地势险要的重要意义时,他对魏武侯说:“此晋国之所以强也。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然而,吴起却认为,地理优势不是霸权兴起的基础。他以三苗、夏桀、殷纣都是在地理优势不变的条件下因政治错误而灭亡的事例证明,政治正确才是称霸的根本,而且犯政治错误的国家即使地理条件优越也会走向灭亡。他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伯王之业,不从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甗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而为政不善,而汤伐之。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有此险也,然而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亲从臣而胜降城,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从是观之,地形险阻,奚足以霸王矣!”他还指出靠地理优势可称霸的认识是危险的,批评魏武

《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虽然《史记·苏秦列传》认为苏秦的游说对象是赵肃侯,但现代史学界的主流论点认为苏秦应生活在不早于赵惠文王时期,故本文采用赵惠文王的说法。参见王阎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10页;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42—343页。关于苏秦在赵国的活动考证,参见沈长云等著:《赵国史稿》,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版,第 184—186页。

《楚策四·客说春申君》。

《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於西河》。

侯看重地理险要的观点是“吾君之言，危国之道也。”

(三) 任用贤能是霸权政治实力的核心

现代学者认为，政治实力包括国家性质、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国家的领导、组织和决策能力。《战国策》中没有关于政治实力构成要素这种概念，但是在《战国策》中，君主和大臣们政治品德和领导力常常被视为是霸权政治实力的核心要素，即所谓“明君贤相”论。明君是强调君主个人领导力的重要性，贤相则是强调决策层集体领导力的重要性。《战国策》中的多数人物将是否任用贤能作为君主是否英明的衡量标准。他们认为世界上贤能很多，关键在于君主们是否加以任用。他们都将齐桓公称霸的政治实力核心归结为是齐桓公能任用贤能。例如，在与齐宣王讨论为什么齐桓公能称霸而齐宣王就不行时，王斗的解释是齐桓公喜好任用贤能，而齐宣王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先君好士，是王不好士”。鲁仲连继而认为齐桓公不仅喜好贤能，而且在选拔人才时不拘小节。他以齐桓公不计较管仲的三次错误，委其大任，继而称霸天下为例说明这一点。他说：“管子并三行之过，据齐国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邻国。”苏代认为齐桓公的高超领导力体现为他信任谋臣。当燕唵王问苏代为什么他认为齐宣王当不上霸主时，他说因为齐宣王“不信其臣”。虽然，苏代这样讲有激励燕唵王重用宰相子之的目的，但后者认为他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并相信了他的说法。

战国时期的战略家们甚至认为，在任用贤能方面，君主的领导力有高低之别，这种区别不仅决定一国能否建立霸权，而且关系到所建立的霸权等级。在中国古代，人们将霸权分为皇、帝、王、霸四个不同的等级。例如《管子》一书中有“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的说法。燕国的郭隗就认

《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於西河》。

黄硕风：《综合国力新论：兼论新中国综合国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

《齐策六·燕取齐七十余城》。

《燕策一·燕王唵既立》。“匡”，纠正。

《管子·兵法第十七》。“帝业”、“王业”、“霸业”的解释，参见《古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0，1603，105页。

为,一个君主将贤能待之为师的可以建立帝业、待之为友的可以建立王权,待之为臣的可以建立霸权,待之为仆的则国家灭亡。他对燕昭王说:“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

书中也有人认为贤相与明君对于霸权的政治实力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种认识往往将首相的重要性等同于明君的作用。例如,楚国的一个谋士就认为,如果一个核心贤才离去,拥有天下的君主会失去天下。他以夏朝和鲁国失去伊尹和管仲分别衰败为例论证这一观点。他对春申君说,“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入齐,鲁弱而齐强。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尊,国未尝不荣也。”《战国策》的评论甚至将苏秦说成是决定战国时期霸权的决定性人才,任用苏秦一人即可使天下服从。书中写道:“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

有些人不是从一个贤相的角度理解贤能对霸权的重要性,而是从群臣的角度进行分析。例如,张仪认为,在具备资源性实力的条件下,大臣们的忠诚品德对于获取霸权具有决定性意义。他认为,秦国未能在地理、军事、经济三方面的超强优势下获得霸权,其原因就是秦国的谋臣们不忠于国家。他对秦惠王说:“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忠也。”还有人认为,获取霸权需要许多的善辩和多谋之士。例如,石行秦认为,网罗西周和东周当时那种善辩多谋人士才能称霸。他对秦国的大梁造说:“欲决霸王之名,不如备两周辩知之士。”

(四) 地理条件是称霸的必要条件

《战国策》中的战略家们已经有地缘政治的观念,而且重视地理优势在称霸中的作用,并将地理环境视为实现霸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书中的人物在分析

《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楚策四·客说春申君》。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东周策·石行秦谓大梁造》。“辩知”,能言善辩、足智多谋。

称霸条件时,经常是从一国的地理环境入手。例如,苏秦为秦惠王分析秦国称霸的实力基础时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谓天府,天之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为秦昭王分析霸权的实力基础时也是从秦国的地理环境入手,他说:“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

当时的战略家们已经意识到地理优势在争霸中的双重作用,即地理优势既可以作为称霸的实力资源,也可以作为阻止他国称霸的实力资源。例如,一个谋士为赵国的张相国分析时,将赵国成功抑制齐国的强权并使秦国四十年扩张不能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赵国的地理条件和军事力量。他说,“今赵万乘之强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书中不仅有人分析自然地理条件对争霸的作用,还有人关注政治地理条件在争霸中的作用。张仪从魏国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两方面的劣势入手,向魏襄王解释与秦国结盟的必要性。他说魏国面积小而且没有自然险阻,魏国的东南西北分别与齐、楚、韩、赵四国接壤,与任何一国关系不好,该国就会从一个方向攻击魏国,魏国是这些国家的争霸战场。他对魏襄王讲:“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山大川之阻。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最终,张仪的地缘政治分析说服了魏襄王。

《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

《秦策三·范雎至秦》。“当”,抵挡。“卢”,良犬。

《赵策三·说张相国》。

《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守亭障者参列”意为边境的哨所和城堡星罗棋布;“庾”,露天的粮仓;“与”,盟友,结交;“合”,会和、结合。

三、规范对霸权的作用

战国时期的战争史以及秦国通过兼并实现统一的事实,都会使人们认为战国时期的战略家们不关心国家间规范的政治作用。然而,从《战国策》的人物对话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国家间规范是霸权合法性基础的观点。本文对《战国策》中规范思想分析不在于这些认识是否发自内心或实践是否成功,而重点在于分析这些思想的自身内容。霸权不仅是一种国际地位,而且也是一种国际秩序,因此获取霸权和维持霸权都关系到国际秩序规范的问题。《战国策》中有关社会规范与霸权之间关系的议论体现在许多方面,其中议论较多的三个方面是,规范与霸权合法性的关系,遵守规范与使用武力的关系,以及建立新规范与遵守旧规范的关系。现代理论家对于国际规范的讨论重点在于规范的功能及演变原理,而《战国策》中的人物多是讨论遵守或违反国家间规范的政治效果。

(一) 遵守规范是霸权合法性的基础

《战国策》中关于霸权合法性的论述涉及合法性的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战国时期,周天子对霸权国的承认,是霸权合法性的形式规范;而得到多数诸侯国的认可则是霸权合法性的实质规范。不同的人对于霸权合法性的形式和实质的重要性认识不同。张仪比较看重霸权合法性的形式,他认为秦国通过兵临周王城郊区,占据九鼎、地图和户籍,控制天子就能获得霸权的合法性。他对秦惠王说:“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然而,司马错更加注重合法性的实质,他认为如果秦国据有九鼎和图籍的方法是攻打韩国和挟持天子,这不但不能使秦国获得霸权的合法性,反而是十分危险的。他反驳张仪的观点说,“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

《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按”,按,压住。九鼎和图籍是周天子的王权标志,有如现代政治中的权杖或图章。掌有这两样东西就有了以天子名义号令诸侯国的形式合法性。

《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

书中的一些策士们认为,要得到多数诸侯国对一国霸权的承认,只靠武力是做不到的,霸权国还得遵守国家间规范才行。秦国的一个谋士认为,战胜国对何种态度对待他国和已签订的条约,关系到其他诸侯国是否能够心悦诚服地接受其霸权地位。他认为,胜而不骄的可称王;签约而不生气抱怨的可称霸;前者能使所有国家服从,后者可使邻国参加合纵同盟。他对秦武王说,“王兵胜而不骄,伯主约而不忿。胜而不交,故能服世;约而不忿,故能从邻。”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人们已经意识到,霸权国能否带头甚至是自觉地遵守国家间规范,对其霸权地位具有重大影响。美国总统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削弱美国国际政治动员能力的现象,似可从反面印证这种认识的合理性。

(二) 规范提供霸权动用武力的合法性

《战国策》中的战略家们很注重霸权国动武的合法性问题。许多战略家认为,如果使用武力缺少合法性就会伤害霸权的合法性。例如,当魏惠王出兵进攻赵国时,季梁认为魏惠王的政治目标是称霸,获得各国的信任,但策略却是用攻打赵国的邯郸以扩大土地的方法提高声誉,这种作法适得其反。他给魏惠王讲了个南辕北辙的故事,并告诫他,靠强兵攻打他国越多,越缺少领导他国的合法性。他说:“今王动欲成霸王,举欲信于天下。恃王国之大,兵之精锐,而攻邯郸,以广地尊名,王之功愈数,而离王愈远耳。”

霸权国动武的合法性来源是多方面的,但书中人物提到较多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目的的正义性。例如,在分析在什么条件下秦国才应该出兵时,秦国大将白起认为,当霸权国出兵的目的是安抚恐惧的国家,或是征服骄傲的国家,或是诛灭无道的国家时,该国才能号令诸侯,平定天下。他对秦昭王说,“抚其恐惧,伐其骄慢,诛灭无道,以令诸侯,天下可定。”

第二个是进行征讨的对象是邪恶国家。例如,苏秦认为,受拥戴的霸权国

《秦策五·谓秦王》。“交”,骄;“从”,纵。《战国策》的不同版本的点校者对于“秦王”是何人有不同意见。东汉高本认为是秦始皇,而后代的校勘本则认为是秦武王。笔者采纳的是秦武王的说法。对该问题的考证参见缪文远:《战国策考辨》,北京,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70页。

《魏策四·魏王欲攻邯郸》。“举王”,兴起的王,“举”,攻取。

《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缮兵》。此处的“秦昭王”即“秦昭襄王”。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66—267页。

一定要用军事力量消灭暴政国家,重建制度混乱的国家,消灭邪恶的国家,攻打君主残暴的国家。他对齐闵王说,“当世之举王,必诛暴正乱,举无道,攻不义。”尽管苏秦是为了燕国的利益来影响齐王的对外政策,但是他的观点得到了齐闵王的赞同。张仪也认为对正义国家发动战争缺乏合法性。基于战争双方只能有一方是正义的逻辑,他认为暴乱的、邪恶的或叛逆的国家攻打仁义的、正义的或太平的国家都将自取灭亡。他对秦惠王说:“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

第三个是征讨对象的文明程度低。自认为代表先进文明的国家对被看作是野蛮的国家使用武力具有合法性。例如,战国时期,蜀国不属于中原文明的一部分,被视为野蛮国家。因此,当司马错向秦惠王解释为何秦国进攻蜀国比进攻韩国具有合法性时,他给出的理由是蜀国是西部少数民族的领头国家,而且有过桀、纣那样的暴政。他说“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

(三) 建立新规范对霸权是必要的也是有风险的

《战国策》中的政治人物已经意识到,霸权国建立新的霸权秩序就需要根据社会变化,改变现行的国家间规范。例如,赵国大臣赵文进和赵造劝谏赵武灵王不要进行胡服骑射改革,赵武灵王则以尧、舜、禹三王和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等霸主都采用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规范为例,说明与时俱进地修改规范对建立一个新霸权的必要性。他认为不必过多地模仿以往的霸权规范,现在的规范与过去的规范不同无可厚非。他说:“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如教而政。……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虽然,人们无法从赵武灵王的话中判断他所说的“服”、“教”、“礼”是指国内规范还是国家间规范,但从他以三王五霸为例,我们可以推测他所提到的规范至少包括了国家间规范。

书中的一些战略家已经认识到,修改国家间规范对建立新霸权是必要的,

《燕策二·客谓燕王》。“举王”,兴起之王;“举”,攻取。

《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秦惠王前》。

《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间居》。“如”,依从、依照。

但也是危险的,特别是改变诸侯国与周朝等级关系的规范。战国时期,国家间的等级规范是多方面的,其最具代表性的规范是国君的称谓。周朝国君称为“天子”,诸侯国的国君称为“王”或“公”。所有想建立新霸权体系的诸侯国都面临,延续原有国君称谓规范,还是以“帝”取代“王”为本国国君称谓的两种选择。使用“帝”的称谓意味着与周天子有了平等地位。称谓规范的改变就是建立新霸权体系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违反现行国家间规范,很可能因此引发其他诸侯国的反对。谨慎的战略家们认为建立新规范需要试探而行。当秦国给齐闵王送来“帝号”时,苏秦认为在不知其他诸侯国是否认可齐王为帝的前提下称帝是危险的,因此建议齐闵王先看看各国对秦国称帝的反应如何再做决定。如果秦国称帝无人反对,则齐王也称帝,否则就不能称帝,这样可得到天下人的支持。苏秦对齐闵王说,“秦称之,天下听之,王亦称之,……秦称之,而天下不听,王因勿称,其於以收天下,此大资也。”

有的战略家则利用修改国家间规范对建立霸权的双重作用,破坏敌对国家的争霸事业。例如,为了削弱魏国争霸地位,秦国的卫鞅利用魏惠王急于建立新霸权规范的心理,劝他带头建立称帝的规范,而后再去征服齐、楚两国。魏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其结果是,魏国违反诸侯国国君与周天子之间的等级规范,其行为导致齐、楚及其他诸侯国的联合反对,使之实力削弱,失去称霸条件。书中记载是,“卫鞅见魏王,曰‘……大王有伐齐、楚之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旗旂,从七星之旃。此天子之位,而魏王处之。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履其十万之军。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国,而东次于齐,然后天下乃舍之。”

四、争霸的基本战略

《战国策》中的许多政治人物都相信,战略的正确与否对争霸的成败具有

《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史学家们对苏秦劝齐王勿称帝一事的时间及历史背景有争议。缪文远:《战国策考辨》,第120页。

《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说”,悦;“旂”,旗上飘带;旃,军旗;“跣”,光着脚。

决定性作用。例如,魏国宰相惠施认为,获取王权靠法度,但要获取霸权得靠计策。他说,“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计。”楚国策士陈轸更是将战略视为国家称霸的根本,他说:“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陈轸这种战略决定论的观念与现代人的信念几乎相同。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战略课题调研组就认为,“国际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战国策》中有关争霸战略的议论没有大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概念区分,两者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争霸角度来讲,《战国策》中的主要战略就是兼并战略和结盟战略。

(一) 兼并战略

《战国策》中所记载的许多事件是大国兼并小国,强国兼并弱国。这些事件反映出,当时的政治人物不仅普遍认为兼并战略是实现霸权的有效途径,而且主张采取兼并战略。在农业社会,兼并战略的原理是:人口与土地的结合形成经济实力,众多的人口可组建强大的军队,兼并他国土地可削弱他国经济和军事实力,提高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从而实现霸权。秦国有谋士就对秦武王讲,只有连续不断地兼并其他国家,使各国不敢反抗,占领其他诸侯国,逼近周朝边界,使各诸侯不敢过阳侯,韩和楚不敢出兵;达到这样的结果,秦国才能实现三王五霸那样的霸业。他说,“今王破宜阳,残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国,徙两周之疆,而世主不敢交阳侯之塞,取黄棘,而韩、楚之兵不敢进。王若能为此尾,则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

称霸的兼并战略需要远交近攻、逐步蚕食的政策,是书中战略家们的一个重要认识。例如,范雎为秦昭王分析为什么齐国打败楚国后,扩充了大片土地却无法占领。他认为并非齐国不想占领这些土地,而是齐楚之间隔着其他国家的这种地理形势使齐国的兼并战略不奏效。范雎说:“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得地哉,形弗能有也。”根据相同的原理,范雎建议秦昭王要采取远交近攻战略,这样攻占多少土地就能

《魏策二·齐魏战於马陵》。

《秦策二·楚绝齐》。

李少军主编:《国际战略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页。

《秦策五·谓秦王》。“雍”,拥有;“徙”,步行;“世主”,国君;“交”,通过;“尾”,终了。

《秦策三·范雎至秦》。“弗”,不。

并兼多少,而且采取到远处征伐楚国的战略是不合理的。他认为韩国与秦国领土相互交织,这对秦国非常不利,因此秦国应首先兼并韩国。他对秦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

苏秦为燕文侯分析燕国应与秦国还是赵国结盟时,讲的也是兼并战略的远交近攻原理。他的分析是,秦国离燕国很远,中间隔着赵国,秦国攻下燕国也守不住;而赵国与燕国相邻,赵国要攻下燕国却很容易。燕国关注与远处秦国的关系却不关心与邻居赵国的关系是大错误。燕国与赵国结为合纵之盟才有安全保障。苏秦对燕文侯说:“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兴号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众,军于东垣矣。渡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于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国必无患矣!”

由于兼并的结果是吞并他国,因此书中的战略家们还有关于兼并彻底性的论述。有人认为兼并战略的最终成败取决于对人的兼并而非对土地的兼并。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的兼并包括土地和人民两个方面,只占领土地而不灭亡该国人,将有被该国复国后反兼并的危险。国家的灭亡有物质上的和观念上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是根本。能否改变被占领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决定了兼并战略是否实现了最终目标。一位名为造的客卿用吴与越、齐与燕的历史事例向秦国宰相穰侯说明兼并战略需要彻底的道理。他说,“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齐亡于燕,吴亡于越,此除疾不尽也。”

(二) 结盟战略

称霸的结盟战略与兼并战略具有同等悠久的历史,两者在历史上曾具有同

《秦策三·范雎至秦》。

《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计无过于此者”,没有比这更大的错误决策了。

《秦策三·秦客卿造谓穰侯》。

等重要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宪章建立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规范。此后,兼并战略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结盟战略成为现代国际政治中争取霸权的最主要战略。结盟战略的原理是,在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国际体系中,当一个强国通过结盟方法组建成实力强大的同盟,该国如果担当该同盟的盟主,这个国家即获得体系内的霸权地位。如果该同盟是体系内最强大的同盟,其盟主就是最大的霸权,如果是唯一的同盟,其盟主就是该体系内的唯一霸权。卫鞅为秦孝公分析魏国的霸权基础时说:“夫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

《战国策》中有许多关于结盟的记录,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苏秦提倡的合纵和张仪提倡的连横。合纵是以齐、楚、赵、魏、燕、韩这六国结盟抵制秦国的战略,即所谓“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则是破坏六国同盟以促进秦国称霸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是拉拢一个弱国进攻另一弱国,也被称为“事一强而攻众弱”。

苏秦对于结盟称霸战略具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认为这一战略的关键是盟国的相互信任与团结。集体行动的最大障碍是参与者违约背叛,因此苏秦建议赵惠文王通过与山东诸侯会盟的方式规定盟友受到第三方攻击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并以交换人质的方式保证各国履行义务,从而实现霸业。苏秦说:“故窃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国从亲,以俟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约曰:秦攻楚,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韩绝食道,赵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韩、魏,则楚绝其后,齐出锐师以佐之,赵涉河、漳,燕守云中。秦攻齐,则楚绝其后,韩守成皋,魏塞午道,赵涉河、漳、博关,燕出锐师以佐之。秦攻燕,则赵守常山,楚军武关,齐涉渤海,韩、魏出锐师以佐之。秦攻赵,则韩军宜阳,楚军武关,魏军河外,齐涉渤海,燕出锐师以佐之。诸侯有先背约者,五国共伐之。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关以害山东矣!如是则伯业成矣!”

连横的目标是破坏六国同盟,其原理是小国为私利会违约,搭秦国的便车。

《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

《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俟”同“摈”,排除、去除。此处采纳赵惠文王的说法,见注释5。

秦惠王接受张仪的连横倡议是因为他相信六国同盟成员的利益不同,就像很多绑在一起的鸡一样乱动,难以配合。他对寒泉子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於栖之明矣。”张仪提出连横结盟的原理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申不害给韩昭禧侯解释,为什么韩国应与秦国结盟的理由就是弱国的机会主义思想。他认为,韩与秦结盟,秦能称王,韩就能称霸,秦不能称王,韩则可避开秦国的威胁祸患。他说:“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霸;强国不能王,则可以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先与强者,圣人之计也。”这种与强者结盟的战略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追随强者的战略逻辑比较类似。

《战国策》所讨论的兼并与结盟两种战略并非是互斥的,而是交替使用的互补战略。书中关于两种战略的讨论不过是以何者为主和何者为辅的问题。从战略史上看,齐国称霸是以结盟为主兼并为辅,而秦国则是兼并为主结盟为辅。在书中,即使强烈主张以兼并战略获取霸权的谋士们也不排除运用结盟战略。他们多是采取兼并为主、结盟为辅助的战略,而且结盟对象的选择经常是服务于兼并战略的。例如,张仪向秦惠王建议的称霸战略就是以兼并为主辅以结盟的大战略。他向秦惠王建议的打破合纵同盟的战略是,攻占赵国,兼并韩国,使荆、魏两国臣服,但与齐、燕两国结好,从而建立霸权。张仪说:“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

(三) 战争时机

兼并与结盟都需要以军事征伐为支撑,因此《战国策》还讨论了战略时机问题,特别是讨论了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的时机选择问题。《战国策》中的许多战略家认为后发制人更有利于赢得霸权。例如,苏秦用一个三段论的方式为

《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

《韩策三·谓郑王》。“韩昭禧侯”,即“韩昭侯”。

追随国家的逻辑参见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95;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69.

《秦策一·张仪说秦王》。“举”,攻占。

齐闵王分析后发制人的优势。苏秦认为,先发制人后患多,而后发制人可依靠较多的盟友,盟友多力量就大。人多势众可压倒寡助者,能赢得战争,做事得人心,必然得利。大国采取后发制人战略,不费力就能成为霸主。他说:“臣闻用兵而喜先天下者,忧……后起者藉也。并且说:“夫后起之藉与多而兵劲,则事以众强适罢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则利必附矣。大国行此,则名号不攘而至,伯王不为而立。”

在后发制人思想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坐山观虎斗的思想。在齐楚两国进行争霸战争时,陈轸为了防止秦国助齐攻楚,对秦惠王讲解了坐山虎斗如何有利于秦国获取霸权。他先讲管与劝管庄子待两虎相斗受伤后一举获得两只老虎的故事,然后建议秦惠王等齐国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失败后,再前去救齐国,这样名正言顺。他说:“齐楚今战,战必败。败,王起兵救之,有救齐之利,而无伐楚之害。”虽然陈轸的目的是用坐山观虎斗战略说服秦国不要进攻楚国,但这种战略对秦国来讲的确有益,因此秦惠王接受了陈轸的战略建议。苏代劝燕惠王别与赵国相争,以免秦国坐收渔人之利。他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劝燕惠王说:“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痹大众,……强秦之为渔父也。”这个例子强调的是要防止给别国提供坐山观虎斗的机会。

书中有关坐山观虎斗战略的讨论已经注意到,该战略的成功条件是斗争双方实力相似。坐山观虎斗战略的目标是消耗其他争霸方的实力。如果坐观结果是胜方实力大增,则是养虎遗患,坐山观虎斗战略就失败了。例如,魏国包围赵国的邯郸,昭奚恤建议楚宣王不要援救赵,坐观赵魏互相攻杀。景舍则主张救赵。他认为楚不救赵,赵就可能灭亡,这相当于楚帮助魏灭赵。这种可能将迫使赵为避免灭亡与魏合作,共同对抗楚国。景舍建议楚宣王派出少量部队援赵,加剧赵魏之争使其两败俱伤,这才有利于楚国扩大势力范围。他对楚宣王说:“夫魏之攻赵也,恐楚之攻其后,今不救赵,赵有亡形,而魏无楚忧,是楚、魏共赵也,害必深矣!何以两弊也?且魏令兵以深割赵,赵见亡形,而有楚之不救己也,必与魏合而以谋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为赵援。赵恃楚劲,必与魏战。

《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藉”,垫在下面;“适”,到达;“罢”,疲乏;“塞”,阻隔;“攘”,挽袖。

《秦策二·楚绝齐》。

《燕策二·赵且伐燕》。“且”,将要;“痹”,麻木。

魏怒于赵之劲,而见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释赵。赵、魏相弊,而齐、秦应楚,则魏可破也。”根据《战国策》记载,“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睢、濊之间。”

五、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战国策》的争霸思想曾长期受到儒家学者的批评,但是国家间的争霸历史却历尽千年而不衰,直至今天的全球化信息时代,争霸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了解《战国策》中有关争霸问题的思想认识,不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现实的国际政治,而且还可在综合国力研究、国际体系研究、国际战略研究和中国崛起战略研究四方面得到启示。

(一) 对国家实力研究的启示

政治实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战国策》中有关霸权实力是以政治实力为基础的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有关霸权实力基础的分析有所不同。现代理论基本上是把资源性实力(领土面积、人口、经济、军事)视为霸权实力的基础。即使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性,但主流观点依然是硬实力是软实力基础。即使重视软实力的学者也多强调文化资源实力,而非操作性的政治实力。然而,如果我们以政治实力是综合实力基础的思维框架观察当今世界政治,我们会发现,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并不亚于经济决定论,也许更多一些。《战国策》中有关霸权综合实力是以政治实力为基础的论述,给我们带来的理论问题是:如何用科学方法验证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何者是综合国力的基础。在我们未能有效实证之前,我们需要问一下,如今以经济实力为国力基础的假定与当年以军事实力为国基础的假定在可信性上有区别吗?

领导力是国家政治实力的核心。领导力是政治实力的核心这个信仰古今一致。但是,当制度决定论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后,有关领导力的研究重点转向决策制度研究,而不再是决策者和决策集体的研究。进入21世纪,关于决

《楚策一·邯郸之难》。
同上。

策者和决策集体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国际政治心理学代表了这一趋势。《战国策》中有关国家领导力的议论,多是侧重于领导人的道德和用人政策。这给我们的启迪是,我们可以从领导人的信念、领导集体的结构、国家的官僚体制三个方面研究领导力与国家政治实力之间的关系,领导力与对外决策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力与国际动员能力之间的关系。

任用贤能是国家领导力强弱的标志。《战国策》有关任用贤能与霸权关系的分析有两点与现代观念不同。一是衡量国家领导人道德水平的标准是他任用贤能的情况,二是被任用的贤能的类型决定了霸权的有无或等级。这种以高级官员的水平为衡量国家领导力的方法也许并不完美,但却比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缺乏衡量国家政治实力标准的状态先进。借鉴《战国策》这种衡量国家领导力的方法,我们可以人才流动为标准衡量国家的政治实力。人往高处走和水往低处流是同样的自然规律,因此人才从政治实力弱国流向政治实力强国成为普遍的国际现象。以人才流动的方向和程度作为衡量国家政治实力甚至软实力的标准,有可能是合理的。

(二) 对国际体系研究的启示

世界中心转移是人为努力的结果,而非自然形成的变化。《战国策》中有关霸权兴衰的解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人为努力是否正确,而不是自然轮替。苏秦认为,三王的兴起和五霸轮替都是这些领导人不安于现状,努力奋斗的结果。他对燕易王说:“且夫三王代兴,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这种认识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试图寻找世界霸权转移的客观原因的方向不同。结合《战国策》将霸权转移归结于人为努力的结果,和现代理论认为霸权转移有客观规律的观念,我们可以从寻找导致领导力衰败或增强的客观因素入手,研究霸权转移的原理。

Rose McDermott, *Political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Jerold M. Post, *Leaders and Their Followers in Dangerous World: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Jerold M. Post ed, *The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with Profiles of Saddam Hussein and Bill Clinton*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燕策一·人有恶苏秦於燕王者》。

等级规范是国际秩序的基础,但不同时代的规范不同。《战国策》中关于社会规范与社会秩序的认识是,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等级规范的基础上。这种认识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体系无政府性是国际冲突根源的原理相同,但与应尊重国家主权平等的现代国际政治原则不同。这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国际规范的建立需要结合平等原则和等级原则,而不能只依据一种原则。这如同为了保证拳击比赛的平等与公平,既要有裁判胜负的规则也要有区分重量级的规则。前者是平等原则,后者是公平原则。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多是依据平等原则研究国际规范功能的,如果结合等级和平等两个原则进行研究,我们将可以深化对国际规范功能的认识。

霸权自身可以产生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战国策》中有关霸权使用武力的合法性来源的分析与现代正义战争理论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给我们提的启示是,霸权本身可能自己营造出对外使用武力的合法性。霸权的国际责任、意识形态和规则制定权都具有创造霸权对外使用武力合法性的作用。

(1) 当一个国家被较多国家接受为霸权时,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认为该国有以武力保护盟友、维持现存国际秩序、保持其霸主地位的责任。(2) 一个霸权被接受的原因之一是较多国家认同该国的意识形态。霸权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中心文明优越观,从而使霸权有了对非中心文明实体使用武力的合法性。(3) 当一个霸权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它就具备了主导国际规范制定的地位。在其主导下制定的国际规范所维持的利益,多数与霸权国利益一致,这也为以武力维持此类利益提供了合法依据。

(三) 对大战略理论研究的启示

成功的大战略的核心是其创新性而非战略模式本身。《战国策》中有关争霸战略的议论多是对立的。这给人们的启示是,争霸战略作为实现一种政治目标的方法必然是多种多样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虽然对有史以来的争霸战略类型进行过多种总结,但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成功的争霸战略是可以被成功复制的。这也许是因为争霸战略的本质是创新,模仿前人的争霸战略无法成功。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了不同战略成功的条件,但是都忽视了争霸战略的创新本质,即争霸战略是无形的,是因时代而变的,是战略家们因地制宜发明

的。也就是说,历史上已有的争霸战略可能都不适用于后来的大国崛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恰巧符合了大战略的这一性质。从争霸战略不可成功复制的角度出发,现代国际战略理论研究的重点似应转向,成功的争霸战略是如何发明的和发明成功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这两个主题。

成功的结盟战略以战略诚信为基础。《战国策》中有许多关于合纵或联横结盟成败的记录,这些记录反映的结盟成败原理是,盟主有诚信则结盟成功,合作者缺乏遵守条约的诚意则结盟失败。书中关于结盟战略不可靠性的议论,与后来卢梭的捕鹿游戏模型有很强的相似性。《战国策》中的战略家们将结盟战略的不可靠性归结为结盟者缺少诚信,而卢梭则将其归结为结盟者不相信盟友的诚信。这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现代结盟理论侧重于共同利益,组织功能以及合作观念的研究,然而对于信誉在结盟中的作用研究不多。如果从盟主的战略诚信如何形成,结盟者的诚信来源,结盟者互信的形成原理等角度,深入现代结盟理论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化现有国际安全合作理论,而且可以深化我们对崛起战略成败的认识。

(四) 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启示

中国崛起战略需要采取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在特定条件下有助于增强国家物质实力,但这一原则无法为中国实现民族复兴奠定综合实力的基础。采取综合国力要素平衡发展的原则,中国就会保持政治实力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平衡发展。只有抑制了经济建设优先中形成的拜金主义信仰,综合国力要素才能得到平衡发展。增强政治实力的重点是提高国家的领导力,而提高国家领导力的重点则是干部优胜劣汰的制度建设。从提高国际政治实力的角度讲,中国需要重视吸引人才的制度建设。在全球化时代,有必要借鉴《战国策》中的经验,不受国籍限制,以国际标准引进人才。

中国崛起战略要侧重战略创新。成功的大国崛起战略是在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创造出来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根据不同时代的国际环境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捕鹿游戏模型是指多人集体捕鹿,其中一人或多人开小差去抓身边的兔子,鹿则逃脱。这是说当合作者怀疑其他合作者的合作诚意时,有可以采取为获取实现小利而放弃集体合作大利的决策。这使得集体合作常常失败。

提出了许多外交战略原则,这些原则分别适用于相应的国际环境,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矛盾。由于国际斗争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中国需要适时地调整崛起战略的指导原则,而不必拘泥于已有的旧原则,更不必因经久不变的理论而约束战略原则的调整。随着中国实力地位的上升,不结盟原则的局限性已经出现,中国可参考《战国策》中的结盟战略,制定有利于扩大国际政治支持的战略。《战国策》中的结盟战略与我党的统一战线原则有相似性,这类原则既能指导抗日战争胜利,也有指导中国崛起成功的可能。

结 语

《战国策》中有许多关于国家间关系的思想和认识,本文仅就从霸权问题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归纳。本文是以现代国关系理论概念为基础对《战国策》进行的分析,没有考虑该书的语境问题。分析《战国策》至少可以三个不同的语境为基础,一是以战国时期人们使用的语言和思想观念为语境,二是以《战国策》成书的西汉末年编书人的语言和思想观念为语境,三是以书中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其与说话对象的关系为语境。依据这三种不同的语境,人们在分析《战国策》的霸权思想时很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和启迪。笔者以为,无论以不同语境为前提得出的结论有多么大的差别,只要能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或是有助于中国崛起战略的完善,都是有益的。希望本文能促进更多学界同仁从国际政治角度进一步研究《战国策》。

作者简介

聂宏毅 199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获电子工程学士学位,2002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获军事战略学硕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总参谋部办公厅工作。2008年在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反制高技术主战兵器招法》(合编,2001年)。

电子邮箱: nhy04@mails.tsinghua.edu.cn

李彬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1985和1988年在北京大学分别获技术物理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9年在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工作,1999年8月至2000年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工作。最新著作为《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2006年)

电子邮箱: libin@mail.tsinghua.edu.cn

尹继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博士学位。2006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访问研究。

电子邮箱: benyin109@163.co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1982年在黑龙江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分析》(2008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6年)、《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年)、《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年)、《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年)。

电子邮箱: yanxt@mail.tsinghua.edu.cn

黄宇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本科生。2006年作为交换生在香港大学学习。

电子信箱: hyx05.tsinghua@gmail.com

宋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3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7年获早稻田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译著有《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合译,2005年)。

电子信箱: pkusongwei@yahoo.com.cn

左希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生。2007年在南开大学获国际政治学士学位。

电子邮箱: zuoxiying@gmail.com